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理论之声

向世界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消除贫困事关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是世界性难题。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启示和参考。向世界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让中国减贫经验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推进人类的反贫困进程，既是世界的期待，也是中国的责任。

讲好脱贫攻坚的国际意义

中国脱贫攻坚的国际意义可以从中国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方法等几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是中国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行动。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创造了世界反贫困史上的人间奇迹。其次是中国经验。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有效解决贫困问题的宝贵经验。中国的脱贫成就汇聚了中国智慧，是一本值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研究和借鉴的参考书。这些经验包括：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注重顶层设计、综合施策，坚持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采取分级负责、上下联动的系统运行机制，等等。再次是中国方法。解决贫困问题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唯有找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彻底挖掉“穷根”。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工业化支撑，单纯依靠农业农村发展增加收入，脱贫的收效往往有限，脱贫的基础也难以巩固。中国脱贫攻坚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助力，也与工业化、现代化相伴生。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战略安排中，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的脱贫成就不仅证明了脱贫方略的有效性，而且证明了中国方法的可行性。这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既聚焦脱贫又超越脱贫的方法论启示，即从国家现代化发展总体规划中探索脱贫的长远之计。

讲好脱贫攻坚的制度优势

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缺乏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进行整体推进。有的缺乏整体规划和实施方案；有的有规划却没有高效的执行力；有的没有解决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城乡分割明显，农业农村发展动力不足；有的虽然也采取了专项反贫困行动，但缺乏统一指挥和各部门的统筹协调；等等。而中国的脱贫攻坚之所以成绩斐然，首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构建起一整套具有自身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建立责任体系，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建立政策体系，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相继出台脱贫攻坚政策举措，打出政策组合拳；建立投入体系，保持强大的资金投入，确保脱贫攻坚战的顺利推进；建立工作体系，开展建档立卡，组织驻村帮扶，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建立动员体系，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动员各方面力量合力攻坚；建立监督体系，对各地开展脱贫攻坚督查巡查、民主监督；建立考核体系，出台各类考核办法，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等。毫无疑问，制度优势是中国创造脱贫奇迹的最大秘诀。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是有效反贫困的关键，脱贫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取决于国家的制度优势。但必须指出的是，对外讲好中国脱贫攻坚的制度优势，不是强调唯有中国的制度设计才能解决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贫困问题，也不是建议世界各国照搬照抄中国的制度设计，更不是要在全世界推广脱贫事业的中国制度版本，而在于提示那些依然处于贫困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高度重视解决贫困的制度和体制设计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立足自身国情，在汲取他国脱贫经验的基础上，优化自身的制度设计，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有效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投入脱贫事业，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之策。此外，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必须优化解决全人类贫困问题的全球治理方案，充分发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世界多边机制的作用，更多地依托制度和机制力量推动全人类的脱贫事业。

讲好脱贫攻坚的动力源泉

内生动力不足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反贫困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增长乏力，难以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的虽然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但由于没有实施相应的配套支持政策，贫困人口难以共享发展成果；有的过于依靠外部援助未能重视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有的贫困人口普遍缺乏教育、劳动技能和创业精神。在推进脱贫攻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坚持脱贫攻坚为人民，持续推进脱贫事业，让贫困人口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依然向人民表达了兑现承诺的坚定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这无疑将极大增强中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必胜信心。另一方面，坚持脱贫攻坚靠人民，在推进脱贫攻坚中，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树立脱贫光荣、扶贫光荣的良好风尚；加强对贫困家庭劳动力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服务，促进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移风易俗，抵制陈规陋习，激发内生动力等，以便最大限度激发人民群众投身于脱贫攻坚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讲好脱贫攻坚的方略谋划

摆脱贫困是极为艰巨的任务，完成这样的任务就必须尊重规律、讲究科学、对症下药。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制定了反贫困规划，也明确了贫困地区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所享受的优惠政策，但由于上述政策设计过于宏观，缺乏具体的配套举措，没有切实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反贫困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如何让反贫困政策和行动更加精准，使其直接面向贫困人口，是许多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而“精准脱贫”则是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推出的一大创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落实这“六个精准”，就要做到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实践证明，“六个精准”有助于做到脱真贫、真脱贫，提高脱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讲好脱贫攻坚的大国担当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既从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认识脱贫攻坚的意义，也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待和把握人类的脱贫事业，并为此采取了实实在在的行动和举措。首先，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其次，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推进沿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中国致力于通过“五通”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合作共赢的发展机遇。近年来，中国基建企业走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勇担急难险重工程，让昔日“出门难、运输难”的地区享受通途之便，有效缓解当地因交通落后致贫的问题。中国通过开展产能合作和技术培训，让昔日对产业技术设备“用不起、不会用”的国家用上了中高端装备，加速当地产业升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中国还高度重视在人文、教育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积极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减贫经验，努力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执笔：王公龙）

理论驿站

把握好制度集成创新的关键点

□ 田原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注重协调推进，使各方面创新举措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提高改革创新的整体效益”。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成熟一项推出一项，行稳致远，久久为功”。这既强调了制度集成创新在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对制度的系统集成和创新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般来说，制度集成创新具有融合性、系统性的特点，有利于优化配置制度创新资源要素、促进创新主体有效合作，形成集成放大效应。一方面，制度集成创新能够提高效率、激发活力。对企业而言，制度集成创新有利于降低制度型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对市场而言，制度集成创新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制度集成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发展动能。制度集成创新有利于加速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高端要素聚集，有力支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此外，制度集成创新还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制度集成创新是创新主体协同发展、相互作用，共同创造新业态、新模式的过程。例如，在制度集成创新的推动下，以一体化建设为抓手，能够确保片区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联动链。系统集成后的制度创新能够加速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使得区域吸引力持续增强、优势资源加速集聚、经济发展新引擎不断涌现。

进一步加强制度集成创新，应把握好几个关键点。一是用系统化思维谋划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制度集成创新的关键所在。系统集成要兼顾整体性和重点性，用系统化思维进行顶层设计时要关注整体效益，建立广泛参与的管理工作架构，设计相互补充的制度体系。二是夯实制度集成创新的基础条件。可以说，在制度集成创新的过程中，试验任务和创新举措是基石。要做好系统集成工作，首先要做细做实基础工作，即切实落实试验任务和创新举措。只有在要素完善、资源充足的基础上进行有机融合，才能实现系统集成。因此，要实现制度集成创新，必须把各项试验任务和创新举措落实到位。三是以协同理念推进系统集成。制度集成创新工作牵涉面广，涉及多个部门，相关协调工作多、任务重。要增强制度创新系统性、协调性，必须精准施策、协同推进。一方面，要加强纵向联动，围绕制度创新过程和链条，把各环节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为每项试验任务明确制定时间表、责任人和路线图，形成工作联动推进的责任链和措施链，并通过联动机制发挥实效。另一方面，要加强横向协同，推动不同制度创新主体之间及创新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各种要素有机整合。只有通过纵向联动、横向协同，系统集成中各项创新举措才能形成更大合力，推进制度创新取得整体性、实质性成效。四是营造系统集成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系统集成的外部条件，也是重要保障。要对标国际最优营商环境，在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强化人才支撑、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总之，通过制度集成创新推动发展，需要谋划顶层设计、落实创新举措、协同平衡推进、营造生态环境，四者是有机整体，应当准确把握、全面推进。

（作者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运用前沿技术助推智慧城市建设

□ 刘金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这一重要论述，为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助推智慧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

今年以来，国内众多城市各类在线技术、产品、服务大幅增加，线上消费需求旺盛，很多企业也积极主动地运用数字化改进提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采购等环节，产业数字化发展迎来重要机遇。同时，很多城市的社会组织和广大市民对提升城市治理数字化水平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这势必加速催生一批城市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进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放眼当今世界，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突飞猛进，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势头日趋强劲，对其他产业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也逐步增强，数字化产业正在成长为这些城市的主导性产业。数字经济一般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主要方面。其中，数字产业化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通过对城市现代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数字化知识和数字化信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素，最终形成城市数字产业链和产业集群；而产业数字化一般是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过程、全链条的改造和提升，将数字化镶嵌融入产业发展的程序和环节中。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双轮驱动”和“两翼齐飞”，既能够加快城市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和有机叠加，推进大数据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推广应用；又能够发挥5G等新信息技术在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中的作用，加快政务信息化的全覆盖，为智慧城市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呈现出强大生机与活力，尤其是远程办公、视频会议、政府监管、在线教育、远程诊疗、智慧工地等，成为疫情期间工作和生产生活的新亮点。当前，很多地方都在化危为机、主动作为，统筹谋划复工复产，注重加快发展与高技术产业、科研创新、智慧城市等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发展数字经济的力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不断注入新动能。当下，各地应抓住新机遇，顺应新趋势，制定出台相关举措，推动在线购物、在线娱乐、在线培训、在线直播等的发展，积极开辟和拓展网上消费渠道和消费市场。在此基础上，还要推动网络安全产品及服务在城市金融、能源、通信、交通等领域的应用，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的防护。同时，还应立足城市经济布局、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建设一批高端研发平台、产业创新平台和专业化服务平台，开发建设一批孵化器、众创空间、加速器等，努力做大做强城市数字产业集群。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需要切实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应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监管防治，加强智能化系统在城市公共卫生设施中的应用，建立疫情实时态势感知分析预警系统，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设施，积极探索线上疫情信息监测方式，开展数据的动态采集、实时监测和智能分析，为防控和抗击疫情提供科学依据。要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存储等特性，强化网络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5G技术在城市社区的普及应用，着力提高社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尤其是应推动数字化技术在交通、环境、市政等民生领域的应用，加快推进城市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和升级，不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智能化、智慧化水平。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理论在线

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应向何处发力

□ 吕明元 张旭东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在持续壮大新兴产业的同时，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这就要求我们找准着力点，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传统产业一般包括除高新技术产业之外的众多行业，主要指劳动力密集型的、以制造加工为主的行业。我国的传统产业拥有很大规模，创造了大量产值利税和就业机会，但许多传统产业也存在效率较低、资源消耗较大等特点，转型升级成为当务之急。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将计算机技术、物联网技术、通信技术等技术应用在研发、生产、物流、营销等流程中，能够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机遇和新动力。

（一）

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在线教育、网络电商等逆势增长，为疫情防控创造了良好条件，数字化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作用凸显，并呈现一些新趋势和新亮点。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化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动能。很多传统产业中的企业在疫情期间及时提升数字化能力，不仅加快了转型进程，而且有效提升了业务水平。实践证明，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可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接新的市场需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等提供坚实支撑。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传统产业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径是必然选择。由于数据等要素具有无污染等特点，产业数字化与绿色发展理念相契合，数字化转型为传统产业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打造数字化产业园区生态系统，在园区内进行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运作，并搭配数字基础设施，可在良好的数字生态环境中培育发展新动能，以产业集聚效应驱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产业园区作为各地建设数字经济的重要承载基地，能够汇集物联网、软件开发、线上直播等相关的数字化企业，构建以软件开发、数字加工和大数据孵化为主的数字产业发展生态圈，打造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产业平台，加速形成数字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新增长点的拉动作用，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

还要看到，目前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成本高等问题。在现实中，传统产业硬件方面缺乏智能化装备，软件方面缺乏本地化的技术支撑；中小企业自动化水平低，数字经济专业人才缺乏且流动性大，引才成本较高。一些传统产业的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了解不够，观念较为陈旧，尚未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加之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而转型之后的产出是否满足预期又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有可能会使产业面临较长的转型阵痛期。

二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需解决产权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数据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投入要素，既有与资本、劳动等传统要素相似的生产驱动力，又能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升行政效率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由于数据来源广泛、信息复杂，面临数据产权的确权问题；不同规模企业因资金、技术的不同，网络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差异较大，也面临数据泄露等安全问题。

三是不同行业和区域的传统产业发展水平及数字化程度存在差异。一方面，不同行业在其商业模式与运营管理中存在差异，数字化转型缺乏标准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地区间信息化发展程度不同，传统产业数字化进程不一致。因此，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发展路径依赖等多重挑战，需对症施策。

四是推进“新基建”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面临挑战。“新基建”不仅包括5G网络基站、大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还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智能化改造。传统产业与“新基建”融合，既包括设备设施等硬件方面的融合，还包括生产流程等软件方面的融合，是从生产方式、产品设计到服务延伸等各个环节的数字化再造，面临着人才、技术、资金等难题，需要统筹考虑区域和行业布局，抓住契机稳步推进。

（三）

针对现实中的问题，以数字化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还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发力。

其一，稳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不仅能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而且5G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拉动投资，抗疫情、稳增长，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其二，统筹兼顾推进数字化转型，平衡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步伐。由于传统产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较高，应从企业自身的资金实力、业务发展需求以及长期的发展规划出发，逐步推进转型进程。

其三，以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助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产业特点和数字化程度，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地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进程，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智慧旅游、数字农业等，在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其四，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数据产权和数据安全管理。完善与数字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市场交易规则，重视交易行为合法性合理性的评估，规制不正当交易行为；加强网络安全建设，保护数据产权和个人隐私，出台有利于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系列举措，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作者单位：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商业大学基地）